

论叶剑英“文革”时期对军队稳定和建设的主要贡献

● 梁瑞红

摘要:叶剑英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文化大革命时期,叶剑英在自身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采取种种措施竭力维护部队的安全稳定,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军队的干扰和冲击,大力推动部队的建设和现代化发展,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多年对敌和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信任,使其在“文革”中能够遭受打击而巍然不倒,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我军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叶剑英;文化大革命;军队稳定和建设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1)04-0057-05

作者:梁瑞红,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科研部讲师,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化大革命初期,叶剑英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出于良好的愿望和对毛泽东的崇敬与信任,在“很不理解”的情况下还是拥护毛泽东的决策。然而,“文革”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和大破坏,尤其是在别有用心的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煽动下,造反派对政府机关和军队的强烈冲击,使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逐渐认识到它的严重危害。他与其他老同志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大局出发,坚决与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抗争,采取各种措施保持军队的稳定,在自身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心部队的建设与发展,最终挫败了林彪、江青之流乱军、夺权的阴谋,使国家的钢铁长城始终掌握在人民手里,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文革”时期叶剑英对军队稳定和建设的主要贡献

(一) 竭力减缓动乱对军队的冲击,稳固长城于不倒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他虽然一开始就对“文革”的发动感到迷惑和不解,但作为国家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和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有一点他坚信不疑: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久经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军队的稳定^①。他本着“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②的坚定信念,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乱党、乱军的行为,竭力维持部队正常秩序,减缓“文革”对军队的冲击。

一是积极推动颁布一系列稳定军队的指示、决定和通知,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约束。从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67年初被诬为“二月逆流”遭受打击,叶剑英推动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指示、通知和文件。其中包括1966年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和1967年制定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七项规定”等,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范围加以严格规范,强调部队基层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主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不搞斗、批、改,反对搞“四大”;坚持军队“文革”要在党委领导下,反对无序化;禁止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禁止对军队战备系统和机密单位进行冲击等。这一系列被林彪、江青等人讽刺为限制军队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条条框框”对文革初期军队的稳定和避免过早卷入内乱起了重要作用,并使军内一大批干部免遭“造反派”迫害,有效地维护了部队的团结和稳定。

二是参加军队院校来京串联师生大会,对部队院校师生进行面对面说服教育。为稳定军队局势,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军委讨论决定并经毛泽东批准,分别于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十万人大会。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在大会发言中对一些军队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联、败坏军队名声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规劝与会人员坚持真理,明辨是非,提醒广大师生“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被坏分子利用”,要“走正路”^③,要遵守军队纪律,尽快返校。叶剑英等军委领导的当面说服和劝诫使串联师生受到了正面教育,也鼓舞了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无疑是对“文革”中一些阴谋家乱军、夺权行为的有力抵制。

三是与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的篡权乱军行为展开正面抵制和抗争。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国夺权阶段后,也导致了军内一些机关工作的瘫痪,这引起了叶剑英等军内高级干部的极度担忧和对“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事务的强烈不满。1967年1月11日,军委“文革”小组成立,江青担任“文革”小组顾问,此后,她开始肆无忌惮地干预军内事务,引起了叶剑英的高度警觉。在“文革”小组成立的当天,叶剑英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并强调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④,否则,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在他和其他军队干部的提议下,中央发出了《关于不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9—20日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等参加会议的军委领导和政治部的一些同志坚决反对“中央文革”成员在军队开展“四大”,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江青等人乱军乱党的行为。2月24日,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党政军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碰头会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再次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抵制,被污为“二月逆流”,与会的大部分参与抗争的同志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打击和迫害。叶剑英也因此受到打压并牵连到家人,但他仍然没有屈服,逆流而上,奋力搏击,想尽一切办法稳定军队,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⑤。

四是用“打招呼”的方式告诫军内同志警惕江青反革命集团乱军夺权的阴谋。“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成立以叶剑英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叶剑英遵照毛泽东主席“军队要统一”,“军队要稳定”,“要准备打仗”等重要指示精神,着手肃清林彪在军队的流毒,消除军队的派性,促进军队的团结,并对江青等反革命集团插手军队的企图保持高度警惕。他多次明确,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防止野心家、阴谋家乱军篡党的阴谋^⑥。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打招呼,提醒他们要听从毛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看清方向;平时注重策略,行事谨慎,少说话,不授人以柄^⑦。要“注意警惕,稳定军队,把部队掌握好”,“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⑧。叶剑英的这些工作坚定了军内干部坚决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统一了军内的思想,避免了军队的分裂,也为日后粉碎“四人帮”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稳定全国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二) 尽力保护军内外高级干部,为军队和国家建设保存骨干人才 叶剑英多次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⑨,不能动不动就打倒。早在“文革”开始前,他就竭力保护胡耀邦脱离“左派”冲击。1964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陕西挂职,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他因在陕西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和狠抓生产而遭到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甚至把他的行为和主张上升到路线错误和对抗中央的高度。叶剑英得知此事后,就把胡耀邦接回了北京,脱离了当地“左派”的冲击。“文革”期间,他虽然自身也面临着被揪斗、被打倒的危险,仍然尽力保护党政军重要干部,为军队和国家发展保存力量。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林彪、江青等人借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猛烈冲击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各大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领导人被打倒或被揪斗,纷纷向叶剑英求救。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开列出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使他们免受或少受“造反派”揪斗。1967年初,江青等人力图打倒政治部主任肖华。叶剑英拍案而起,与江青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1975年5月,叶剑英和重新走向工作岗位的邓小平安排胡耀邦到中央读书班学习,为其重返工作岗位创造条件。此后又竭力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叶剑英深信邓小平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⑩,多次为他提供“保护”并支持邓的复出。针对林

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刘邓”的活动,叶剑英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保留刘少奇、邓小平的照片,保存历史的真相。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久,叶剑英就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工作。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军队和各个方面进行治理整顿,叶剑英对此大力支持。不久,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叶剑英因受牵连再次“靠边站”。但他仍然关心、支持和保护邓小平。当毛泽东在江青等人的鼓动下打算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大义凛然地说:“如果把邓小平开除出党,我就辞职。”^⑩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建议,让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经过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的持续努力,中共中央决定给邓小平平反,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正是在“文革”期间一大批军内外干部受到保护,免遭迫害,才使得“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国家建设开创新局面具备了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

(三) 恢复我军训练传统,强化部队军事训练 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军内长期推行“突出政治”的方针,致使军队的军事训练不断弱化,军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认识到这一问题及其危害,就指示重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扭转这种局面。叶剑英认真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从打消顾虑、恢复我军的训练传统入手,大力强化军事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

从1972年开始,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逐步恢复和展开。在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的军事训练着重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为轮训基层干部,大办教导队。1972年2月6日,叶剑英在听取南京军区汇报作战设想和战备工作时要求要在两年之内把连、排干部轮训完毕,使这些基层干部平时会组织训练,战时会组织打仗。中央军委专门为此向全军发出《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要求,全军部队从1972年开始,以军或以师为单位办教导队,对基层干部进行轮训。这一措施使“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军事训练得以部分恢复,干部的军事素质得到有效提高。二是恢复基层训练,提高指战员军事技能和军事素养。他强调指出,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士气、干部的指挥能力以及人和武器的结合状况归根结底取决于基层部队的体制、编制、基层官兵的觉悟和士气。军事训练就是要注重从基层部队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总参军训部的具体要求,全军自1972年2月至1974年底开展了基础训练。我军“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三是适应战备需要,进行“三打三防”训练。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北部边境发生冲突,军事安全压力陡然增大。中央军委根据作战对手的特点,明确提出了我军要加强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以及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训练,即“三打三防”训练。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中央军委把“三打三防”训练提高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三打三防”训练既检验了我军的基础训练,又适应了当时的战备需要^⑪。四是以恢复部队建设为宗旨,恢复重建部分军事院校。“文革”前期,部队院校大量被裁撤,原有的125所军事院校只剩下43所,且制度不健全,编制体制十分混乱。为适应部队建设和发展需要,从1972年开始,总参、总政和总后勤部提出了整顿方案,对原有部队院校加以治理整顿和恢复。1973年11月中央军委批准恢复和增建41所军事院校,使全军院校达到83所,部队部分军事院校的恢复和重建为部队输送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提高干部军政素质都起了重要作用。从1972年起,全军各项训练制度开始恢复,有关训练的规整制度不断健全,“使我军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革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新局面”^⑫。

(四) 进行治理整顿,大力纠正军内“左倾”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他坚决顶住江青集团破坏、干扰的种种压力,着手对部队进行初步的整顿,清除军内林彪余毒。1972年8月在他发表的《扭转极左思潮,把国防科研搞上去》讲话中指出:“林彪的余毒没有肃清,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还没有扭转过来,这个问题要引起十分重视,一定要扭转这种状况。”^⑬1972年11月,他发表《整顿领导班

子,加强人民空军建设》讲话,要求军队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明辨是非,不能让“极左思潮泛滥”,“加强领导班子,这是关键。”^⑮同时为了防止打击面过宽,叶剑英又强调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行为时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在军队内部,“不要打击面过宽,不要杀人”^⑯。叶剑英大力支持邓小平对部队进行的治理整顿的一系列措施。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通知全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常委会工作。在军委常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就提出把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该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编制问题、压缩军队定额问题、干部问题,目的就是进一步把军队整顿好。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集中讨论了军队整顿和体制编制调整问题。叶剑英发表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军队编制“很乱”,“很不适应打仗的要求”,而进行编制体制调整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我军建设,准备打仗的一项重大措施”^⑰。此后,叶剑英与邓小平顶住压力,排除干扰,抓紧时机对军队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军内一大批受过迫害的老同志被重新任命。为了防止“四人帮”抢班夺权,他还及时对驻京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调整和调动。叶剑英和邓小平对军队的治理整顿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期间江青之流虽然千方百计乱军夺权,但由于军队始终掌握在叶剑英等“可靠的人”手里,使“四人帮”的阴谋终难得逞。

(五)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为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奠定基础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夺国家和军队领导权。在党和国家面临存亡绝续的生死关头,叶剑英等老同志再次挺身而出,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以快打慢”,果断行动,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为军队和国家的发展建设迎来新时代奠定了政治基础。对此,江泽民1995年在《叶剑英传》出版发行暨叶剑英诞辰九十八周年座谈会上中肯地指出,“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⑱

二、叶剑英“文革”期间特殊历史贡献的原因分析

(一) 坚强的党性观念和一生为国为民的政治道德操守 叶剑英一生不断追求真理、公平和正义,在对敌斗争、党内斗争和各种严峻考验面前立场坚定,时时做到“大事不糊涂”,这是他牢固的党性观念和一生为国为民政治道德操守的生动体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党的干部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富于斗争精神,作风正派,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决不做那种投机钻营的墙头草、两面倒的人物。”^⑲他也正是用革命的行动践行自己的信念。叶剑英早年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积极参与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蒋、汪相继叛变革命后,他又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关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的事业终生奋斗,几次挽救中国革命于危急时刻。长征途中,他冒着杀头危险,毅然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始终抱着“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⑳的坚定信念,他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竭尽全力稳定军队,适时推动军队的各项建设,和华国锋共同领导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毅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此后,叶剑英又匡护邓小平,奠定了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基础。但他从不居功自傲,第一个提出离休,为年轻干部让出位置,实现了中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可见,叶剑英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私心,是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政治道德操守和牢固的党性观念使他总能够在中国历史重要转折关头“为革命事业立下功勋”^㉑。

(二) 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积累的丰富经验 叶剑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职业习惯使他养成了为人随和、谨言慎行的做事风格,而且深通政治艺术,在面临严峻形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谨慎、科学地分析形势,研究策略,作出决断。而长期的对敌和党内斗争积累的丰富经验更能使他临危不乱,临机决断又注意策略的运用。1936年至1941年间,他去西安、上南京,到武汉,转长沙,再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抗日合作与反分裂斗争。从1946年初开始,他又作为国、共、美三方北平军事调处执行委员中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进行周旋,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有

力地维护了中国人民、党和军队的利益。而自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他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积累了明辨是非,临机决断的丰富经验,使他能够在“文革”期间既能坚持不懈地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行为进行抵制,又注意斗争的策略与方法,虽然备受冲击而不弯腰,坚持原则而有韧性,守常应变,果断出击,不愧毛泽东对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②的高度赞誉。

(三) 在党内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崇高威望 “文革”时期,叶剑英虽然屡遭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但最终能够化险为夷和保全名节,与他在党内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有密切关系。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叶剑英对党和军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从而赢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军队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信任和尊重。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赞扬叶剑英在长征途中挽救党和红军的卓越贡献。叶剑英在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时,比较重视策略的运用,使其在“文革”当中多次能够转危为安,并几次被毛泽东委以重任。“二月抗争”事件后,叶剑英即使与其他老同志都受到打压,但与其他人相比,叶剑英并没有完全失去毛泽东的信任。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就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刘伯承、聂荣臻等召集在一起研究国际形势,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九一三”事件后,又让他重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使得中国军队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江青集团抢班夺权的阴谋难以得逞。

深厚的革命友谊和共同为国为民的信念使叶剑英在“文革”期间坚定地与周恩来共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周恩来多次在叶剑英面临危机时提供帮助。“在十分危难的情况下,每次都是周恩来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叶剑英‘过关’”^③。叶剑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使他在军队稳定和建设以及粉碎“四人帮”中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当时,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只有他还能够基本掌控局面,又德高望重,其他同志有的被打倒、遭迫害,有的已经远离领导核心,有的则资历较浅,难以独撑危局,只有他能把各种正义力量凝聚在一起,一举粉碎“四人帮”集团抢班夺权的阴谋。

(四) 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 叶剑英一生包括在“文革”期间能够做出特殊历史贡献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洞察事物发展趋势,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行事,从而使其行动够深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叶剑英的历史贡献不仅是其个人品质和党性的具体表现,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成就了他的功绩。

叶剑英等老同志在“文革”中与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的坚持不懈的抗争和对军队稳定与建设的卓越贡献再次证明:我们党是一个伟大正确的党,我们的军队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

注释:

①④⑦⑩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第264页、第284页、第295页、第277页、第312页。

② 丁家晖:《中国元帅叶剑英》,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③⑨⑭⑮⑯⑰⑱⑲⑳ 《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第427页、第419页、第428页、第414页、第435页。

⑤ 张廷栋:《叶剑英的伟大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⑥⑬ 云香主编:《叶剑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第100页。

⑧ 程中原、夏杏珍:《邓小平、叶剑英与1975年的军队整顿》,《纵横》2003年第8期。

⑪ 张江明:《叶剑英与邓小平》,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主办,2000年,第136页。

⑫ 刘志青:《“九一三”事件后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恢复》,《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

⑬ 江泽民:《在〈叶剑英传〉出版发行暨叶剑英诞辰九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4月21日。

⑰ 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叶剑英在广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页。

⑲ 薛治生主编:《叶剑英的伟大一生》,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⑳ 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责任编辑 魏延秋)